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正在看本期大樣時，收到南京大學皮學軍同學致編者的信，尚趕得及放入本欄中。信中對編者的批評、對作者的指正，表現出該同學對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愛護。近年來，越來越多的在校博、碩士研究生閱讀並撰稿支持本刊，這是令編者十分欣慰的。推出學術新人是本刊宗旨，在如皮學軍一樣對學術認真的年輕學人的支持下，編者將努力克服各種困難，不辜負讀者的期待。這裏，先向各地作者、讀者祝新年好！

——編者

致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者的一封信

尊敬的編輯先生（女士）：

您好！我是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01級碩士研究生，自2001年9月入南大以來就很喜歡拜讀貴刊，且受益不小。但據本人觀察，近幾期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編輯質量並不高，僅以2003年10月號為例：

一、伊斯雷爾（John Israel）著，郭曉東翻譯的〈聯大模式對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〉一文，有一個很明顯的錯誤，這就是第46頁倒數第10行中關於

聞一多遇刺的時間：文中是「1946年1月15日」，同頁中編輯篩選的頁邊小字中也是同一日期，但第50頁倒數第13行中關於聞一多遇刺時間卻是「1946年7月」，兩個時間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呢？正確時間應是1946年7月15日。看來編者沒有好好去核對。

二、筆者近日為做有關「赤腳醫生」的畢業論文，忙於搜集文獻，正好讀到10月號方小平寫的〈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——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〉（以下簡稱方文）一文。該文對我幫助不小，但方文史料不夠準確及全面。例如，「赤腳醫生」一詞是否如方文所說，在1968年〈從「赤腳醫生」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〉一文發表後才出現的？從當年的報刊查看，這篇文章首先是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《紅旗》上發表，然後《人民日報》、《文匯報》於9月14日轉載；另外，在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第十二冊中（頁505-506），也有毛澤東對該調查報告的批語和修改。

據我搜集到的史料，事實上早在1965年9月5日上海《新民晚報》就刊載了何公心撰寫的〈貧下中農盛讚這個「赤腳醫

生〉——記金山縣優秀衛生員胡蓮華〉一文，是「赤腳醫生」首次在媒體出現；而「赤腳醫生」的稱呼在民眾中則產生得更早。

筆者查閱許多資料後認為，方小平出此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沿用了葛子長的〈中國第一個「女赤腳醫生」的曲折人生〉（《貴州文史天地》，2001年第2期）的相關內容時，沒有好好去考證，這是作者的疏忽。

作為貴刊讀者，我衷心希望編者把貴刊辦得更好，使《二十一世紀》真正成為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學者的必讀刊物。

皮學軍 南京

2003.11.21

「公共知」理念如何成為可能？

知識份子，面對無處不在、並正在全球不斷擴張的商業意識形態，應扮演何種角色，抱以何種態度應對呢？貴刊2003年10月號金泰昌的〈生活世界與日本公共哲學思考〉，可謂切中了這一問題的核心。金文對於當前日本知識精英現狀一針見血的批評，即使拿來批評其他地區的知識精英，也毫不過份。但是，金氏提倡的這種由「公知」和「私知」向以「仁」為核心理念的「公共知」的轉換，在思想和現實的層面上究竟如何得以促成？但是在日本，這種以「仁」為核心理念的「公共知」的轉換是否可能？眾所周知，在日本的傳統道德文化中，「仁」的價值排序一直擺

在次位，反而是「禮」、「忠」、「義」的價值觀念，一直為日本人所重視，至今仍對日本社會存有深遠的影響。在今天日益保守化和右傾化的日本社會，這種轉換是否可能發生，仍成疑問。從現實的層面來看，「公共知」的理念如何能在「公知」和「私知」的雙重夾擊下生存，並在社會文化中形成一定的影響力，也是一大疑問。

張望 香港
2003.10.27

「漢語知識合法性」是真問題嗎？

讀了余世存：〈知識自覺與現代轉型〉（2003年10月號）的文章，坦率的說，感覺不好。作者提出了一攬子過於宏大的題目，卻一個也沒有回答。某些已構成文章中心概念的說法究竟是甚麼意思也語焉不詳，例如「漢語知識的合法性」的說法，過多似是而非或想當然的論斷。例如，文中指為底層寫作是「邀功傲世」，三農、收容遣送、民工等問題上突破禁區的努力是知識人新的名利場，等等，這類說法是很不負責任的，對冒着風險作此努力的人不僅不公正，而且是一種侮辱。

文章不少觀點，無論學理上或事實上都很有問題。如，把在自由民主方面的理論闡釋和現實努力，說成借助「西方世界知識的觀念體系」，進而就斷言「中國的知識生產停留

在前現代階段」。如果說這是借助西方世界知識的觀念體系，他自己提出的「真正的當代漢語只有一個：中國必須唾棄一切專制制度」，不也同樣來自這個觀念體系嗎？更何況，唾棄專制制度和爭取民主自由難道不是一體兩面嗎？我感到奇怪是，難道為了貶低當代「漢語知識」，就抬高構成傳統主流文化的那些要素。所謂儒道經典、法家學派「從不同層面為中國人提供了生存的哲學」，「中國的傳統知識在倫理領域、善的領域……等方面都有相當親切宜人的解釋」，等等。如此溢美、如此溫情脈脈，用在別處的批評懷疑精神在這裏蹤跡全無。

余世存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才氣的學者，但這篇文章問題不少，我甚至不認為「漢語知識合法性」之類問題是真問題或者說是有意義的問題。

蕭雪慧 成都
2003.11.3

啟迪與困惑

陳來〈從「思想世界」到「歷史世界」——余英時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述評〉（2003年10月號）一文中可看到，余英時把朱熹這樣一個「純粹思想家」放到一個中等層次的政治史框架中去考察，在由「事件」編織的情境之網裏去尋求「思想」的動力，其「讀出」的結果是與純文本解讀不一樣的。如陳來先生所述「通過對歷史世界的敘述，突顯出朱熹的政治關切、政治主張、政治理想，一句話，突顯朱熹的政治文化觀念，進而呈現當時士大夫群體的政治文

化」。所謂「內聖外王」是個老原則。在歷史脈絡下，這一原則如何落實為政治行動和政治決策？權力世界中皇權、官僚、理學三者又究竟如何具體互動？我推斷余先生大作將會對此多有啟迪。

在未拜讀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之前，愚也存有稍許來自直覺的困惑。如認為〈西銘〉「把宇宙宗法化」，由此推出「君主和一切人因同出於『父天母地』而變成『兄弟』」，因此所謂的宗法化包含着以此種方式削減君主絕對權威的意義，縮短了君與臣的距離」的結論，似乎有些費解。或許是余先生原意，也或許是陳先生解讀，僅據〈中庸章句序〉一篇，就將「道統」與「道學」分別開來，而使「周孔分裂」，真不知是否符合朱子整體思想之基本旨意？其二，經五代十國之文化融合，儒學需要一個重新整合在所必然。但這裏有政治史意義上「秩序重建」的現實需要，同時也不能忽視「知識更新」角度上的邏輯必然。中國天學計算中由於忽略「歲差」，所以每隔三五百年必會出現「曆不符象」。由是自先秦至漢以後，學術關懷自然對「天」敬之、畏之、申而論之。而自晉虞喜發現「歲差」，直到唐一行《大衍曆》才真正記入曆法。此後「曆必符象」，天學失去了神秘的意義。顯然，宋學不向「心性」轉向則再無出路。這樣看來，中國學術以先秦原儒為基礎，而在知識形態上依次呈現出漢、宋、清三大階段的傳統解釋，仍然具有相當的說服力。

蕭延中 北京
2003.10.25